

东 陆 书 院 文 从



蒙树宏文集

第二卷 学鲁文存

装帧设计	刘雨	责任编辑	张爱成	责任校对	严永欢	特约编辑	冯峨	策划编辑	陈曦	出品人	吴云
------	----	------	-----	------	-----	------	----	------	----	-----	----

ISBN 978-7-5482-2611-6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number 978-7-5482-2611-6.

9 787548 226116 >

定价：73.00元

《蒙树宏文集》第一卷 鲁迅年谱稿

《蒙树宏文集》第二卷 学鲁文存

《蒙树宏文集》第三卷 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

《蒙树宏文集》第四卷 现代文学六人集

《蒙树宏文集》第五卷 现代文学论集

《蒙树宏文集》第六卷 七十年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树宏文集. 第2卷, 学鲁文存 / 蒙树宏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6
(东陆书院文丛)
ISBN 978-7-5482-2611-6

I. ①蒙… II. ①蒙…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鲁迅研究—文集 IV. ①I217.2
②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9914号

出 品 人: 吴 云
策 划 编辑: 陈 眇
责 任 编辑: 陈 眇
特 约 编辑: 冯 峰
责 任 校 对: 严 永 欢
责 任 印 制: 张 爱 成
装 帧 设计: 刘 雨



东 陆 书 院 文 丛

蒙树宏文集

第二卷 学鲁文存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350千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611-6
定 价: 73.00元

社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4167045。

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鲁迅史实研究

谈鲁迅研究的史料学	(1)
鲁迅旧式婚姻史实探微	(17)
鲁迅和周作人关系述评	(28)
鲁迅和秋瑾	(46)
“鲁迅谈章太炎”史料钩沉	(54)
关于鲁迅和爱罗先珂	(61)
关于鲁迅和刘文典二题	(73)
关于鲁迅谈刘文典被蒋介石拘押的问题	(73)
《关于鲁迅》在昆明	(75)
关于鲁迅购读《天演论》的时间	(81)
关于鲁迅致山本初枝的一封信的写作时间	(90)

从南京盛传鲁迅“转变”说起

——鲁海钩沉录之一	(93)
鲁迅与北新书局的版税纠葛	(103)
鲁迅的经济情况述略	(117)
鲁迅生平史实探微（选入二题）	(126)
关于章太炎为鲁迅所书的条幅	(126)
关于 1927 年 1 月 25 日欢迎会的情况	(127)
谁是“中国的镜子”？	
——介绍《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	(130)
学鲁札记十八则	(133)
鲁迅是哪个单位保送去日本留学的？	(133)
谈鲁迅于 1908 年从日本回国	
——从寿镜吾给鲁迅的信说起	(135)
鲁迅是否在杭州九峰草堂工作过？	(139)
关于鲁迅在北京教育部所任的职务	(142)
关于“竟删美育”问题	(146)
谈鲁迅“支持世界语专门学校”的问题	(148)
从《罗曼·罗兰评〈阿 Q 正传〉》说起	(150)
《求乞者》的“夹衣”	(152)
关于鲁迅的病	(152)
娜拉的出路	(155)
张沛君小议	(158)
关于把《乐人扬珂》视为“滑稽小说”	(160)
关于《阿 Q 正传》故事的时间下限	(162)
鲁迅何时开始对云南有较大的影响？	(163)

被骂的鲁迅	(168)
鲁迅与分数	(171)
关于《日本新政考》	(172)
谈鲁迅到日本时我国的留日学生人数	(173)

鲁迅论丛

读“我以我血荐轩辕”

——学习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	(175)
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及其发展	(180)
鲁迅的个性解放思想及其发展	(194)
论鲁迅和尼采	(211)
简论封建复古派和鲁迅对它们的斗争	(227)
鲁迅和维新思想的关系及其决裂	(236)
从“新世纪的曙光”说起	(243)
鲁迅与革命文学运动	(248)
谈鲁迅思想“变迁的径路”	(261)
鲁迅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270)
谈鲁迅的战斗艺术	(277)
《呐喊》《彷徨》的思想内涵	(286)
鲁迅小说中的妇女群像	(302)
《呐喊》《彷徨》中的农民形象	(317)
《呐喊》《彷徨》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326)
《呐喊》《彷徨》艺术琐谈	(341)
关于《故事新编》研究的若干问题	(351)

读《野草》随笔	(371)
关于《狂人日记》	(377)
读《伤逝》札记	(405)
《白光》赏析	(415)
《秋夜》赏析	(418)
《这样的战士》赏析	(423)
《十四年的“读经”》赏析	(429)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读后感	(432)
评《鲁迅留学日本史》	(439)
《比较视野中的鲁迅文艺思想》序	(446)
地方鲁迅研究史的第一本理论专著 ——《历史的高峰》简评	(450)
《鲁迅史实研究》原书后记	(456)
《鲁迅论丛》原书后记	(457)
《学鲁文存》原书校读附记	(460)

谈鲁迅研究的史料学

在鲁迅研究中，史料的整理、研究等是一个重要方面。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为研究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提供必要的条件。毛泽东同志曾说：应该“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在鲁迅研究中要做出正确的结论，除了要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之外，还要有充分的史料做根据。

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搜集、鉴别、编订的科学。史料残缺不全，就无法做出判断；未经考订，就区分不清史料的真伪、对错；至于缺乏编订，如没有系年或没有按专题、专人集中等，史料就很难为我所用。因此，毛泽东同志深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并在理论上反复强调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著作。马克思呢，“为要写《资本论》中讨论英国工厂法的二十页多一点文章，他把整个图书馆里英国与苏格兰工厂视察员所作特殊

调查团底报告的蓝皮书都参考遍了”（拉法格《马克思回忆录》^①）。列宁也指出：《资本论》“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加以研究的结果。鲁迅在史料工作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他为了写《中国小说史略》而编录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明以来小说年表》等；在搜集小说史的材料时，真是“废寝辍食，锐意穷搜”（《〈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可见，毛泽东、马克思、鲁迅都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鉴别和编订。这种态度和方法，也正是我们研究鲁迅时所应该采取的。

—

鲁迅研究的史料学的对象，总的来说，应包括两个方面：以客观情况作为搜集和研究的内容，如鲁迅著译的时代背景、分类、版本、目录，鲁迅的生平史料，等等；以人们对鲁迅的著述、思想、生平等如何认识和评价作为搜集和研究的内容，如鲁迅同时代人谈鲁迅、当代人谈鲁迅、鲁迅研究的研究、鲁迅研究史的研究，等等。从具体的项目来说，则可以考虑下列几个方面。

甲、史料的搜集和发掘。搜集，一般是指把零散的集中起来；发掘，是把不为人所知的发现出来。前者如《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的出版，后者如《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和《自言自语》的重新刊载等。当然，二者有时会交叉，不大容易截然

^① 本文集中的注释大多因时间跨度大，现已难一一查证和完善出版项等，故保留原貌。

分开。这方面的工作，除史料汇编外，还包括社会调查、档案资料整理等。

乙、史料的注释和考订。以《鲁迅全集》来说，当中牵涉到的人、事、背景十分复杂，有些地方不好理解。鲁迅在1936年4月5日的《致王冶秋》中曾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因此，对鲁迅的著作就要进行考订，加上注释，方便读者。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共二万三千余条，约一百九十万字，工作量很大。有一位参加鲁迅日记注释定稿工作的同志谈到，“有时仅仅为了注释一个人物的生卒年月，就需要进行大量调访工作，甚至求助于公安部门和国外的有关工具书”（《许广平的一生》，第217页）。就是这样使劲，有些疑难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对生卒年月只好空缺或加上“？”以表示存疑。注释和考订工作要这样下力气，就因为它重要。像《鲁迅全集》的注释，那是动用了数以千计的人力的结果，是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总汇。这不只对鲁迅作品的普及做出了很大贡献，就是对专家学者也有不小的参考价值。

丙、史料的编纂。鲁迅的著译很多，内容很丰富，无法一一记住。以鲁迅的日记来说，所记的人和事多而零碎——何年何月何日和何人来往，何年何月何日发生何事；诸如“信札往来，银钱收付”（《马上日记》）等都很难寻找。在这样的情况下，史料的编纂，如目录、索引、史料长编和年谱等，就为人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长编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来辑录有关史料，依此排比而成书。这可以减轻读者翻检的辛劳，乃是深入研究的出发点。鲁迅在1932年8月15日的《致台静农》中曾说，有些文学史，实为“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

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这说明长编有其意义及局限。鲁迅并不轻视长编，他在《致曹聚仁》中说自己“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年谱则是在对史料的真伪、对错进行鉴别，在对史料的价值高低进行衡量的基础上，把分散的史料以时间为顺序而系统化。年谱起码得有时间和谱主事迹两部分，有些还有国内外大事记、注释、按语和附录、图表等。好的年谱可以通过谱主的事迹反映时代，可以表现谱主的思想道路、性格特点等。鲁迅相当重视年谱的作用，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

一

我想，在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方面，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一）确定主攻方向。鲁迅是一个在多方面有成就的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回忆、研究鲁迅的著述也汗牛充栋，人们精力有限，不大可能在各方面都齐头并进。鲁迅研究者总是根据主客观条件（社会需要、比较容易找到资料、有研究兴趣等）选定自己的主攻方向和确定阶段性的奋斗目标，把注意力集中于一点或某些方面。选定主攻方向以后，就要紧紧地围绕它积累资料，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资料。例如研究《呐喊》，除了研究作品本身外，就一要注意鲁迅关于《呐喊》的论述；二要注意人们对《呐喊》的评论；三要注意和《呐喊》有关的社会背景；四要注意和《呐喊》同时代的小说，特别是

和鲁迅的小说风格比较接近的作家作品；五要研究中国小说史，特别是《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和《红楼梦》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创作特点；六要研究外国作家如果戈理、契诃夫、安特莱夫、芥川龙之介等对鲁迅的影响；等等。确定主攻方向，有助于克服“旁骛”的缺点。看书要广一点，经常随便翻翻，这是对的。但是，研究就要认准目标，念兹在兹，如果“旁骛”，就会多走弯路甚至浪费时间和精力。

(二) 力求全面，搜罗无遗。在自己的研究范围里，应充分掌握有关资料；事无论大小，都在收集之列。然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般原理的指导之下，通过比较、分类、分析、综合，从中理出发展线索，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来。例如研究鲁迅与“国民性”的关系，就要全面掌握情况：要看到鲁迅长期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像《热风·恨恨而死》等，也要看到他对好的“国民性”的肯定，像《热风·无题》；既要看到鲁迅的小说曾受“国民性”理论的影响，如《阿Q正传》等，也要看到他对“国民性”理论已有所怀疑，如《幸福的家庭》《伤逝》等。如果不是这样，就容易以偏概全，下判断时会发生偏颇。

我们说史料要力求全面，还包含这样的意思：不要忽视有些很荒谬的观点。那些肆意地歪曲、恶毒地攻击鲁迅的言论，凡是“有质量的”，都应列入积累资料的范围；“毒草可以肥田”，这类荒谬的观点有时也可以诱导我们进一步思考。

总之，在资料积累得尽可能多而全的基础上，就比较容易看清问题的全貌，就有可能左右联系，上下挂钩，资料就会活起来了。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指出：“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发展形

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这对鲁迅研究自然也完全适用。

(三) 边收集，边整理。零散的史料，如满盘珠子，必须用线把它们串起来，才好拿；如一张网，必须有纲，才能提。例如鲁迅日记的内容，就像珠子和网，必须用一定的标准使之条理化——或按时间，或按人物，或按事件，或按书刊等加以集中；集中以后，或按拼音字母顺序，或按笔画的多寡加以排列，这样才便于寻找。否则，就很难找到甚至找不着，无法使用，只是一堆死资料而已。单单收集资料而不加整理的人，马克思把他比作消化不良的肠胃病患者。这类人就是吃得再多再好，也无法增强体质。

(四) 锲而不舍。资料要力求全面，这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了，必须持之以恒，日积月累。鲁迅曾说：“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关于鲁迅的生活》，第25页）这点，对专门从事史料工作的人的重要性不必说了，就是从事理论研究，甚至是搞创作的同志，在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内，也要注意不断地积累资料。例如姚雪垠为了写《李自成》，就摘录了数以万计的资料卡片。又如胡适，他在五四时期的理论研究属于宏观方面的、大刀阔斧的工作。但是，他认为“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胡适的日记》，第273页），所以，他用了半年的时间来编《章实斋年谱》，以使自己有“拿绣花针的训练”。从事鲁迅研究的人，研究逐渐深入时，问题就越具体，要求就越高，就越不能依赖别人而必须自己动手积累资料，就必须把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结合起来。

(五) 认真、严肃。这说的是对待史料工作的态度问题。史料真可谓浩如烟海，人们不可能穷尽；史料的情况很复杂，人们也不可能样样都搞得一清二楚。史料的缺漏、失误很难绝对避免。这是说客观结果。但是在主观上则绝不应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态度要认真、严肃。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是我们学习的榜样。1858年，当他从事经济学的著述工作时，伦敦出版了麦克拉伦的《通货简史》。马克思当时无钱买书，也借不到，只好向恩格斯求助。他说，这本书也许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马克思把掌握全面情况提到“理论良心”的高度，提到政治责任感的高度来看待。因此，我们在鲁迅研究中，对待史料应该慎重。譬如说，摘抄时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该断章取义，“六经注我”；不能是“想当然”，凭印象，应该下艰苦细致的功夫去核实、查对。否则，就会出现纰漏。如有一本书说道——

《斯巴达之魂》朗诵后，大家深受感动。当读到
“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
一段时，大家公认为是妙句，用笔加上密圈……

这里，就有不少以意为之的猜想。发生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核对《斯巴达之魂》原文，对《集外集·序言》产生误解。鲁迅在该《序言》中是这样说的：

……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
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
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
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
警句……

鲁迅在这里是说“大风灭烛”等是别人所写而为“大家传诵的

警句”，而《斯巴达之魂》很受这类警句的影响。我们试想：一、鲁迅怎么会说自己的文章中的若干句子“是大家传诵的警句”呢？二、《斯巴达之魂》中并没有“披发大叫……大风灭烛”这些话。三、十卷本的《鲁迅全集》的注释早已指明“大风灭烛”的出处。所以，这一类错误是因为粗心大意。当然，要求一点错误也不发生、百分之百准确无误可能是苛求，核实、查对以后也仍然可能有笔误、串行等，但不核实、不查对，出错的可能性显然就会大得多。另外，有些执笔者还会不顾事实去编写故事。冯乃超就指出：上海有人“在文章中说我常去鲁迅家，还同去上海的福建馆子喝黄酒。有一次，鲁迅冲着我莞尔的说：‘喝两杯是勿会醉眼朦胧的’……这类故事，乍听来似乎有趣，实际上是编造的”（《鲁迅研究动态》1983年第8期，第9页）。这种做法，就不是一般的不认真的问题了。

三

鲁迅不热心写自传，他在1925年写的《自叙传略》，1930年写的《鲁迅自传》和1935年写的《自传》，合起来还不到三千字；同时，他也不愿意别人写鲁迅传。在1936年5月8日的一封信中，他说：“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因此，他的不少生平史实一般人并不知道。有幸的是，在中国作家中，有关鲁迅的回忆文章最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的自传过于简略的缺陷。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回忆文章的内容和历史事实有时会有出入，不可能完全没有差错。这是连和鲁迅很亲近的人所写的回忆也很难避免的。例如周作人说鲁迅于1902年